

对经济效益病态与根源的实证考究

杨 钦 锋

一、我国经济效益的病态透视

目前我国的经济效益虽不能说已跌进历史的最低谷，但已表现出比较严重的病态和持续恶化的趋势。事实上，我国经济效益下降的迹象是从“一五”时期以后就有的，但是近几年，尤其是通过一个时期的治理整顿，在诸如“经济过热”、“恶性通货”等一系列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问題刚刚被初步抑制的同时，经济效益却更加恶化，人们对此不能不加以关注。那么，我国的经济效益状况究竟如何，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到底落后到何种程度呢？下面的分析可以回答这一问题。

(一) 我国的生产力要素是在高投入低产出的水平上运转。

表 1

| 年 份 | 1953 | 1957 | 1962 | 1965 | 1970 | 1978 | 1984 | 1986 | 1989 |
|--------------------------|------|------|------|------|------|------|------|------|------|
| 百元固定资产 原值实现的利税 (元) | 30.8 | 34.2 | 15.8 | 29.7 | 32.3 | 24.8 | 22.3 | 19.9 | 17.5 |
| 初含产品物耗率% | 43.5 | 43.5 | 48.7 | 48.5 | 49.3 | 56.0 | 57.1 | 58.7 | 62.1 |
| 每吨能耗实现的国民收 入 (元) | 1522 | 1146 | 572 | 755 | 727 | 573 | 756 | 799 | 857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能源消耗按标准煤计算。

从表1可以看出，物化劳动效益是下降的。1. 百元资产原值利税率1989年与1953年相比，下降了约13个百分点，据此，1989年少实现利税1300多亿元；2. 物质资料的消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53年为43.5%，1989年为62.1%，上升了18.6个百分点，仅此1989年就多消耗了2556亿元的物质产品；3. 每吨能耗实现的国民收入1953年为1522元，1989年为857元，下降了665元。上述的“二降一升”便损失了数千亿元的国民收入。

表 2

| 年 份 | 1952 | 1957 | 1960 | 1965 | 1970 | 1978 | 1983 | 1986 | 1989 |
|------------------------|-------|-------|-------|-------|-------|-------|-------|-------|-------|
| 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 工资利税率% | 151.6 | 225.6 | 334.7 | 357.8 | 397.7 | 337.2 | 329.9 | 240.8 | 193.9 |
| 全部工业企业百元工资 净产值(元) | 452.6 | 380.7 | 444.9 | 480.5 | 556.0 | 554.2 | 510.8 | 476.6 | 510.4 |
| 国营工业企业全员劳动 生产率(元/年) | 4200 | 6376 | 5880 | 8995 | 10167 | 11131 | 13049 | 15451 | 18320 |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88年和《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有关数据整理。

表2表明，我国的活劳动效益也不理想。如果仅从人均产值来看，似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不缓慢，但如果把活劳动的全部费用考虑在内，则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产出率是下降

的,这可从表中的工资利税率和百元工资净产值看出。

表 3

| 年 份 | 1952 | 1957 | 1960 | 1965 | 1970 | 1978 | 1981 | 1987 | 1989 | 1990 |
|---------------------|------|------|------|------|------|------|------|------|------|------|
| 资金利润率% | 19.2 | 23.9 | 32.6 | 20.9 | 20.1 | 15.5 | 15.0 | 10.6 | 7.2 | 2.7 |
| 资金利税率% | 25.4 | 34.6 | 43.6 | 29.8 | 30.6 | 24.2 | 23.8 | 20.3 | 17.2 | |
| 百元工业总产值占用的定额流动资金(元) | 23.1 | 19.4 | 24.5 | 25.6 | 29.9 | 33.4 | 32.0 | 33.1 | 32.2 | |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88年和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

从表3可以看出,资金的投入与产出也是不成比例的,据统计,1978—1989年全民工业企业累计资金投入达6.61万亿元,约相当于前29年投入资金之和,而资金的使用效益却很低下。1.百元资金利润率1960年最高达32.6%,1990年降到最低,只有2.7%,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2.资金利税率1960年最高达43.6%,1989年最低为17.2%,据测算这个指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财政少收约80亿元;3.定额流动资金占用愈来愈高,1989年与1952年相比,每百元工业产值多占用资金9.1元。近几年企业流动资金缺口加大,尽管是多种因素所致,但资金占用大、周转慢、效益低也不能不是原因之一。

与上述生产要素低效使用相伴而行的是企业产品成本居高不下,亏损企业和亏损额大幅度上升。1957年我国工业产品百元销售收入的成本为68.1元,以后几乎是年年上升,1965年为69元,1980年为73.3元,1983年为75.8元,1989年升至82.7元;国营商业百元销售收入的流通费用1980—1981年为7.8元,1983—1985年为8.4—8.6元,1986—1989年上升为9—9元;全民所有制企业可比产品成本1952年是下降2.3%,1965年下降8.8%,1978年下降4.6%,进入80年代,这一指标由下降转为上升,而且上升的幅度越来越大,1984年上升2%,1985—1987年上升约7%,1988年上升15.6%,1989年又增至22.2%。成本上升的同时,是亏损企业和亏损额的逐年增加,1980年我国的亏损企业很少,亏损额也只有34.3亿元,1989年国营工业企业亏损面已达19.2%,亏损额136.6亿元,1990年1—10月亏损面又扩大为35%,亏损额高达228.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7.4%。^①

(二) 我国的基建效益在下降。

多年来,我国的投资规模逐年扩大,而投资效益却一年不如一年。表现在:1.投资系数(即每增加1元国民收入所需的投资)越来越高,“一五”时期平均为1.9元,1981—1983年平均为2.6元,1989年为2.98元,1989年与“一五”时期相比,同样多的投资少实现国民收入近500亿元;2.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下降,“一五”时期为83.6%、“二五”时期为71.5%，“三五”时期最低为59.4%，“七五”时期的1986年为79.1%,1989年又降为75%;3.基建资金占用额大幅度增加,“一五”时期未完工程占用额为59.1亿元,“三五”时期为322.3亿元,“六五”时期为744.6亿元,“七五”时期的1986年为1115.0亿元,1989年高达1808.9亿元;4.大中型建设项目投产率在降低,“一五”时期为15.5%，“三五”时期为11.5%，“五五”时期最低为7.4%，“六五”时期为12.5%,1989年降为9.8%。^②以上数据表明,我国的建设资金在扩大,建设周期在拖长,资金占用在上升,投产使用率在下降,基建效益明显不佳。

扩大我们的视角还会发现,我国的经济效益不仅与历史水平“今非昔比”,而且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也相差甚远。10年来,我国的能源工业发展比较迅速,原煤、原油和发电量,目前已居世界前列,但由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调、技术装备落后等原因,使我们失去了

合理利用资源所能达到的最好效益。1986年我国能耗量为8.09亿吨标准煤,是日本的1.86倍,联邦德国的2.34倍,法国的3.84倍,而同期我国的GNP只及日本的13.9%,联邦德国的30.5%,法国的37.5%。^③相差之大的根源就在于我们的能耗高、浪费大。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资料表明,每生产1万亿美元的GNP,我国的能耗是法国的4.91倍,日本的4.43倍,美国的2.1倍,加拿大的1.77倍,印度的1.65倍,^④据此可以推算,即使我国的能源不增加,只要利用率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产值就可翻番,这是多么大的潜力!

劳动生产率是我国增长较快的效益指标,1978~1989年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4.7%,可是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则黯然失色,1986年美国工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的28.9倍,日本是我国的25.2倍,南朝鲜是我国的6倍;分行业看,1989年年我国机械制造业的最佳劳动生产率为2.27万元人民币,而在80年代中期,美国机械行业的该指标为9.35万美元,日本为9.45万美元,联邦德国为6.7万美元,法国为6.38万美元。^⑤悬殊之大,令人震醒!

综合以上分析,可作如下归纳:

(1)我国经济效益的下降是一个持续多年的历史现象,目前日趋恶化,说明其间有着难以遏制的制约因素。(2)党的十二大提出,经济工作要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10年来,这一转变仍未实现,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仍属于高耗低效的粗放型和速度型经济。(3)经济效益下降,给国民经济带来许多“险象”,一是国家财政更加困难,已陷入连年赤字、内外债务夹击的两难境地;二是造成了能源的短缺与浪费并存、生产能力的不足与大量闲置相伴;三是产品质次价高,库存积压增加,有效供给受到限制;四是经济效益如此恶化下去,对我国的“三步”经济战略目标的实现将是一个挑战。(4)高投入、低效益支撑的经济高速度将不会缩小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实际差距,相反只会进一步拉大。因此,严峻的现实已容不得我们对效益问题听之任之了。

二、经济效益病态的根源考证

直观之,目前经济效益的恶化,是由近几年原材料价格上涨,利率、汇率的变动,工资侵蚀以及企业的掠夺性经营等等所致,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是表象原因。对于一个历史性的、持续下滑的经济问题,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的分析是不够的,也将无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为此还应进行深层探源。

(一)生产力要素本身素质低下,制约了经济效益的提高。在发达国家中,经济增长、效益的提高与生产力要素的技术进步水平是正向关联的。18世纪末英国科技产生的生产率与手工劳动的生产率之比为4:1,到19世纪中期,该比例提高到108:1,同时,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也是逐步扩大的,本世纪初是5—10%,到70年代已达50—70%,^⑥而在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目前还不足30%,其原因是我国多数行业和企业生产要素的技术进步是缓慢的。首先,从物的要素看。在高、精、尖技术和设备的另一面,还有大量陈旧的、技术装备低下的设备在运转。据第二次工业普查资料显示,全国重点工业企业中,生产设备性能达到国际一般水平的占13%,属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占22%,还有约65%的设备是处在性能一般或落后状态;从出厂时期论,70年代以前出厂的占23%,其中60年代的设备占13.2%,50年代的占8.6%;分行业看,属于国际先进水平的设备,电子工业占5.8%,机械工业占4.8%,有色金属工业占6.1%,建材行业占5%,化学工业占10.2%。^⑦这样落后的装备,造成高耗低效,如目前全国拥有的近30万台工业锅炉,大多号

称“煤老虎”、“电老虎”、“油老虎”，耗能高，热效率极低。其次，从科技成果的吸收和利用看。建国40多年，我们取得的科技成果的确不少，但由于缺乏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和市场，致使目前我国技术成果的利用率还只有10—30%，而国外的水平一般都在50%左右。同时技术引进的效益也是差的，近10年，我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达1.7万多项（说是先进，实际上大多是别人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技术），耗汇约270亿美元，^⑨可有些技术不是我们玩不转（已经消化吸收的只占10%^⑩），就是大量重复引进，如近几年全国共引进彩电生产线113条，仅广东地区就重复引进30—40条，目前全国的彩电装配能力已超过2000万部，^⑪而1989年的彩电产量只有940万部，生产能力闲置50%，电冰箱、洗衣机等生产线的引进也是如此。最后，再看人的素质。技术进步的关键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目前从总体上说我国劳动者的素质还是比较低的。据统计，1990年全国每万人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142人，高中文化的有804人，文盲半文盲还有1588人。^⑫与发达国家相差2—5倍。

（二）产业结构失衡和区域产品结构雷同，抑制了经济效益的提高。产业结构是配置资源的关键，对于各种资源还较为稀缺的我国，优化产业结构，合理配置资源，对于提高经济效益尤为重要，可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中长线过长、短线过短、基础产业不牢、“瓶颈”制约加剧的状况还比较突出。（1）近二年农业虽有超历史发展，但其前景不容乐观，拖国民经济后腿的状况仍难改变。（2）加工工业受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程度仍在增强。1978—1989年我国的能源产量年均增长4.5%，全国货运周转量年均增长9.1%，而加工工业却年均增长16.2%，几种主要加工产品的年均增速更是大大超前，汽车为13.4%，电视机为43.6%，电冰箱为64.5%，电风扇为38.4%，^⑬造成能源供求缺口加大、运输紧张（目前仅能满足实际运输需要的60—70%），许多企业开三停四、以运定产，据统计，目前全国仅电力缺口就超过20%，年缺电700—800亿度，使25—30%的生产能力不能正常运转，年损失工业产值在3500亿元以上。（3）主要原材料奇缺，大量依赖进口，目前化工原材料进口依存度高于50%，钢材超过30%。^⑭

在产业结构失调、资源不能最优配置、相当数量的资金和物资积压呆滞的同时，又出现了区域产品结构日趋雷同化。据统计，全国20个主要行业各省市平均拥有率达94.8%，26个省市超过95%，其中16个省达到100%。^⑮这种趋同性加剧了地区间的割据和封锁，使地区间的生产资料、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流通人为阻隔，破坏了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生产要素的机制，导致社会内耗加大，整体效益和长期效益下降。

（三）规模经济水平低下，失去了合理规模经营所能达到的最佳效益。规模经济是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单位成本下降而使收益增加的现代化经营管理方式，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在我国由于经济体制和政策的原因，生产资源的合理流动受阻，“大而全”、“小而全”的万能工厂遍布城乡，许多行业和企业还处在严重的规模不经济状态。汽车制造业国际公认的最小经济规模，轿车为30万辆/年，卡车为6—10万辆/年，而1989年我国400多家汽车企业总产量仅为58万辆，生产厂家超过了日、美、英、法、西德、意六国汽车厂家的总和，而总产量不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1987年产量的1/8；^⑯在我国43家大型钢铁企业中，1989年产量还不足百万吨的就有25家，而世界上该行业生产规模一般都在200—500万吨和1000~2600万吨；^⑰我国的彩电产量与南朝鲜相近，1989年在我国由166条生产线武装的76家整机厂中，年产量达30万台的只有10家，而南朝鲜整机厂仅6家，每家生产规模都超过200万台。^⑱生产规模的不同引起生产成本和经济效益的巨大差异。据国际统计资料分析，

在钢铁行业中,若以年产100万吨钢铁的企业的生产成本为100,则当年产量增加到500万吨时,成本将降为73.5;当年产量进一步扩大到1000万吨时,成本也随之降至64.3。由此可以想象,我们流失的规模效益是多么的惊人!

(四)我国经济效益的低下也是与微观经营管理水平的落后紧密相联的。据有关专家计算,在经济效益中,有6成是由科学管理获得,有3成是由科技进步获得,有1成是由投资获得。^⑩由此可见科学管理对提高经济效益的至关重要性。可是在我国的企业里,因管理不善与职工素质差,企业效率低下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已给许多考察过我国企业的外国专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六次访华的日本管理专家三上辰喜,在考察了我国的一些企业后作了如下评论:若把日本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作为100,那么欧美国家为100左右,台湾为60,南朝鲜为50,而中国只有10。^⑪这也就是说,仅因我们管理水平的落后,就带来了数倍的效益差距。

我国企业经营管理落后表现在诸多方面:(1)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素质低,在企业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中,许多企业经营者显得力不从心;(2)对职工思想教育的放松和其他原因,使一些人滋长了“钱多多干、钱少少干、无钱不干”的思想;(3)劳动人事管理制度畸型,长期来“铁饭碗”的就业制度,使企业在用人上几乎无选择权,专业科技人员要不到,闲杂多余人员辞不掉;(4)规章制度既不健全又不严格,任意违反财经纪律、无视操作规程、劳动纪律松弛的现象随处可见;(5)质量管理落后,缺乏严格的质量保证制度和先进的检测手段,废品、次品也能流向市场;(6)财物管理混乱,各种基金不按规定提取,更不按制度使用,物资、能源的消耗无定额,数据不真、不全等等。这样的管理状况,要想提高效率,谈何容易!

(五)非经济因素对经济效益的巨大侵蚀。通过一个时期的治理整顿,那些“官倒”、“官商”、“私倒”们,虽然逐渐销声匿迹了,但作为原因分析,他们对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尤其对经济效益的侵蚀,在此不能不言及。他们钻价格双轨制以及利率、汇率变动的空子,凭借手中的财权、物权、事权,损公肥私,使巨额利润不翼而飞。据有人按“寻租理论”计算,1988年价差、利差、汇差三项合计为3500亿元,相当于当年国民收入的1/3。这巨额的“租金”,国家所得的不多,企业拿到的有限,^⑫却大量地流进了私人的腰包。近二年还有“行业歪风”,各种名目的摊派、赞助费、手续费、好处费、招待费等,耗费极大。这些本该用于积累、提高效益的,却被反过来摊进了成本,企业效益怎能提高!

三、医治效益病态的几点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地领悟到医治效益病态、走出效益困境的一些方略,但考虑到政治安定和政策连续等因素,对某些方面的治理整顿与改革还应逐步进行,近期内可以考虑下列几点:

(一)矫正效益观念,增强效益意识。首先,决策领导层应有整体与局部、长远与眼前等的效益观念,处理好速度与效益、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其次,探索和建立全社会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分行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今年定为“质量、品种、效益”年,各级政府应有长远和全局打算,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切莫再做流于形式的一阵风呼喊。

(二)继续控制总量,调整存量。目前总量控制已有成效,存量调整刚刚触及,今后的工作重点应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进一步调整资产存量,对那些确实只有投入却无产出的低效企业,下决心兼并、转产、关停一部分。

(三) 完善提高经济效益的环境机制。企业是提高经济效益的主体, 目前企业经营活动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还需进一步完善。残缺不全的生产资料市场还限制着企业原材料、闲置设备、人才和技术的必要流动; 刚刚起步的资金市场还需政策、法规的引导和支持; 地区割据、行业不正之风、各种社会摊派, 仍束缚着企业的手脚。这些都有待于整改。

(四) 扶持企业集团, 尤其是跨区域、跨行业的企业集团的发展, 提高我国宏观管理的整体性和规模效益。

(五) 深化企业改革, 探索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动力机制。目前的核心仍是国家与企业之间所有权与经营使用权的分离和交叉的问题。如何建立一个组织形式, 既能保证国家所有权的有效约束, 使企业不致于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 又能保证企业真正具有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责任、利益和权利, 使之能够自主地追求效益和提高效益, 还是今后在实践和理论上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 ①《对我国工业……的几点分析》。《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1年第2期。
- ②《中国统计年鉴》1985、1987、1988、1990年卷。
- ③《近几年我国经济效益的分析》。《管理世界》1990年第4期。
- ④《我国能源开发战略应从增长向提高利润率倾斜》。《经济与管理研究》1990年第2期。
- ⑤《世界经济年鉴》1988年。
- ⑥《科技进步促进各国经济增长》。《经济工作通讯》1990年第5期。
- ⑦《中国年鉴》1988年版第273—274页。
- ⑧《我国产业发展中的技术政策评析》。《管理世界》1990年第6期。
- ⑨《提高经济效益十策》。《经济工作通讯》1991年第3期。
- ⑩⑬《我国当前的产业政策问题》, 中国计划出版社1990年, 第138、105—106、115页。
- ⑪《经济日报》1991年3月14日。
- ⑫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有关数据计算。
- ⑭《轻工业增长中的结构矛盾》。《管理世界》1990年第2期。
- ⑮⑯⑰《1989年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及行业50家评价》。《管理世界》1990年第6期。
- ⑱《整体管理带来整体效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1年第1期。
- ⑲《关于提高企业素质的几点思考》。《吉林财贸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 ⑳《治理整顿与经济发展》。《管理世界》1990年第4期。

· 简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总会计师研究会联合庆贺我校一项重要学术成果

上海市总会计师工作研究会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前就我校会计学系龚清浩、徐政旦两位教授主编的《会计词典》增订本的首次出版发行和该词典发行达100万册以上, 在千鹤宾馆联合召开会议进行庆贺。会议由上海市总会计师工作研究会会长鲍友德主持, 我校博士生导师、总会计师研究会副会

长徐政旦教授在会上谈了主编《会计词典》一书的深切体会。我校副校长谈敏教授也讲了话。他说, 《会计词典》大型词书的问世, 是我校会计学系经多年来努力而取得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 也是同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编辑部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可以相信, 我校的会计学术研究今后在各方支持下, 一定会取得更多的成果。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巢峰同志在会上讲了话。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总编、编审欧阳仲华同志出席了会议。我校前副校长王松年教授, 会计学系主任石成岳教授, 上海市总会计师工作研究会秘书长、我校会计学系石人瑾教授, 总会计师工作研究会副秘书长金祥同志等, 都出席了会议。(朱)